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王文光[1], 尤伟琼[2]

(1.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00;
2. 云南师范大学　发展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整个秦汉时期, 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 有了张骞出使西域, 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 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 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 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 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 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 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 2 世纪的民族志,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关键词: 西域; 民族; 交流; 冲突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23X(2013)02 - 0069 - 05

一

在司马迁没有写出《史记·大宛列传》之前, 中国人对于广义西域的民族情况认识基本上是模糊的, 公元前 3 世纪成书的《穆天子传》是记述华夏族认识广义西域的第一部著作, 书中假托周穆王从东周的都城洛阳出发西征, 向西到了华夏族心目中最西边的"西王母之国", 由于《穆天子传》具有强烈的神话、传说色彩, 所以一般是不作为信史的, 只是把《穆天子传》作为中原地区的民族对西部民族及其文化的初步认识, 因此也就谈不上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文献。

虽然《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张骞的亲身经历, 但是在《史记》中没有"张骞传", 关于西域的民族情况是通过张骞的亲身经历和在大宛等地的转述记录下来的,① 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 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 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 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1] 因此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 而西极远蛮, 引领内乡, 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2](P3318) 从司马迁"西极远蛮, 引领内乡, 欲观中国"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在张骞出使之前, 华夏族认为世界的中心在华夏, 华夏之外的民族都是野蛮人, 但是这种观点在张骞出使之后,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汉武帝开始与西方的交往。因此, 我们才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世界的性质。

在汉武帝时代, 汉民族与匈奴的民族关系是汉王朝的主要矛盾, 这个矛盾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国家大政, 所以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背景是汉武帝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 即"匈奴破月氏王, 以其头为饮器, 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 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 闻此言, 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 使月氏。"[3](P3157) 张骞第一次出使亲临的国家是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 传闻的国家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因此,《史记·大宛列传》可以认为既是中国西北民族历史、中国西北地方历史、中亚民族历史, 又是张骞传、中国西北民族关系史, 还是中国西北、中亚的民族志。故《史记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文光, 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尤伟琼, 女, 云南师范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研究。

① 《汉书》开始为张骞立传, 而且将"大宛传"改为"西域传"。

·大宛列传》是研究中亚史、西域民族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材料，其学术价值重大。

如前所述，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政治生活的核心，它制约着汉王朝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所以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夹击匈奴。对此，梁启超在《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说 “冒顿时代，匈奴大强，西域诸国，皆被服属，凭籍深厚，为中国忧，故当时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匈奴。而发此议而实行之者，自张博望始。”[4](P2022)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是在西汉文帝时进入西域的，汉文帝在他即位的第四年，接到了匈奴单于的一封信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与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P2896) 信中讲的是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冒顿打败月氏，进入西域的情况，匈奴控制了楼兰、乌孙、呼揭等民族，于是与汉王朝发生了对西域的争夺。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首先扶持乌孙，并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了对西域的控制，“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当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5](P3872) 由此也就引发了汉匈在西北地区的矛盾冲突，汉武帝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族共同对付匈奴，于是西域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虽然是广义西域的民族，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完成汉代建立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宏观战略目的，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地理解《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使的，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共历时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先是被匈奴扣留十年，“终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走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3](P3158) 大宛国王欲汉的财物，希望为骞寻月氏，得汉财物，但最终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不成，“(时)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3](P3158~3159) 可是张骞却达到了大宛、康居，抵月氏，游大夏，较为全面地了解了当时上述各地各民族的情况。

二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民族和国家，大多是从民族志的角度进行记述的，由于当时许多西域的民族还没有文字，所以《史记·大宛列传》就成了关于西域最珍贵的民族志文献，或者说是历史人类学的珍贵文献。张骞第一次出使到达的国家其先后顺序是“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3](P3158) 此间，张骞还在西域听到了西域以外的民族情况，例如身毒国、安息、条枝等。

大宛。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先记大宛的地理方位“在匈奴西南，在汉正南西，去汉可万里。”①大宛是农耕定居民族，种植水稻、麦、葡萄，善于酿制葡萄酒；大宛养的马特别多，而且品种好，当时称为“汗血马”。因为是农耕定居民族，所以有较大的城市“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还有不少常备军队“其兵弓矛骑射。”[3](P3160)

康居。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3](P3161) 文中提到的“行国”，即指这个民族是游牧民族，其生产方式为游牧，所以康居属于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习俗上与大月氏相同，所以与大月氏具有民族的亲缘关系，虽然康居有“控弦者八九万人”，但是由于政治军事力量较为弱小，所以在大月氏和匈奴之间左右事之。

大月氏。大月氏原来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史记·大宛列传》载 “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正义》“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洲，祁连山在甘州西南。”[3](P3162) 敦煌郡在今甘肃敦煌市西，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市西北，由此看来大月氏最初的分布地以今甘肃为中心。大

① 这儿的记载有误，大宛应该是在汉朝的西北，而不是在“汉正西南”。

月氏西迁后，分布在大宛西边“二三千里”的地方，在大夏、安息、康居之间，大月氏也是“行国”，随畜迁徙，虽然受到匈奴的攻击，但是在民族源流上仍然是与匈奴同时属于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北方民族群体，所以“与匈奴同俗。”当然，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大月氏由于在民族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可能吸收了欧洲民族，已经开始具有一些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对此《史记》“正义”注引《南州志》说 “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3](P3162) 人民赤白色说明大月氏的民众的肤色为“赤白色”，即我们通常说的白种人，因此大月氏在种族特征上具有欧罗巴人种的一些特征。

大夏。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与汉王朝的空间距离更加遥远，大夏的东南部已经是“身毒国”。大夏的文化特征也是农耕定居，人口众多，“可百余万”，这个数目在当时已经不少。大夏的文化习俗与大宛基本相同，当时大夏还没有产生很大的政治集团，因此也没有大的政治领袖。因为大夏处在交通要道的原因，所以“善贾市”，在都城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在民族关系上，大夏与大月氏的关系最为接近，因为“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3](P3164) 这大约与当时大夏民族已经信仰佛教有关，所以历史学家才说大夏的“兵弱，畏战”，即民族性格较为柔弱。

身毒国。张骞没有亲自到达身毒国，是听人转述的。身毒国的方位在大夏东南几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3](P3166) 身毒国民族与大夏的民族在民族来源、民族文化方面具有共同性。但是也有不同的方面，即“其人民乘象以战。”而大夏民族“兵弱，畏战”。《史记》“正义”补充说 “其民弱于月氏，修浮屠道，不杀伐，遂以成俗。”[3](P3165) 说明中亚、南亚当时的民族大多信仰佛教，同时也说明在汉武帝时代汉民族还不知道身毒国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身毒民众对佛教的信仰，至于佛教是什么就一无所知了。

奄蔡。奄蔡与康居、大月支是具有同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显然奄蔡是中亚地区分布在靠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其西边与大秦接，《史记》“正义”注引《魏略》进一步记述道“西与大秦通，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貂，畜牧水草。”[3](P3161) 则奄蔡国内河流众多，人民随水草迁徙，也是游牧民族。

安息。安息是张骞听到的传闻国家，他也没有亲自到达。但是记述基本准确，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公元前安息最早的中国汉文文献。关于安息的地理方位有些模糊“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由于文中提到的奄蔡、条枝、黎轩的地理方位本身就不明确，所以以之作为参照同样是难以明确安息的地理方位。尽管如此，《史记·大宛列传》对安息的记述却较为丰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说明安息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定居，城市建筑宏大，“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而且商业经济发达，“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币，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3](P3162) 特别有趣的是其货币上的纹饰用国王的图像，这与中国古代的货币有较大的区别。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古代西域货币的了解，而且这与后来在西域考古发掘发现的货币相同。

条枝。条枝同样是张骞没有到过的地方，与安息相比较更加简论，即条枝在安息的西边，临大海，气候恶劣，属于农耕定居的民族，“耕田，田稻。”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权，被安息统治，作为安息的附属国，“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3](P316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以下两点总结。

第一，对于张骞亲自到过的地方，张骞立足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记载了西域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特点，特别是用“行国”与“土著”来对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进行区分，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各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志资料。

第二，张骞对于相关民族的记载还侧重于民族性格的记述，例如大夏人民族性格较为柔弱，“畏战”；而乌孙人民族性格强悍，“敢战”。如果从今天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志书写，具有民族学“深描”的意义。

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完成联合月氏攻击匈奴的使命，汉王朝希望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与匈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张骞分析了当时的民族关系格局，又提出断匈奴右臂联系乌孙的主张，而此时的汉武帝仍然要继续推进攻击匈奴的战略，所以有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攻击

匈奴，由此引出了汉族与乌孙的交往。此外，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完成攻击匈奴的计划，但是汉武帝得知除汉朝之外，海内（天下）还有众多民族（国家），便希望汉朝的影响辐射到当时所知的每一个地方，汉武帝当时的想法是“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P3166）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了乌孙，乌孙“在大宛东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3]（P3161）乌孙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所以叫作“行国”，虽然只有不多的战士，但是民族性格强悍。在民族源流方面应该是与匈奴有亲缘关系，同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乌孙尽管与匈奴在民族源流上相同，但是受匈奴的控制，匈奴曾经杀了乌孙的昆莫。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乌孙本身的记述不算太丰富，但是对于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记载却相对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汉王朝希望联合西域其他民族攻击匈奴的总体战略思想。张骞到达乌孙之后，向乌孙的首领说明来意，不料这时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对汉家公主不感兴趣，而且由于乌孙在地理上远汉近匈，所以诸大臣惧怕匈奴，无人愿迁回故地，张骞又一次不得要领而归。此外，乌孙内部也有矛盾，导致张骞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联合乌孙攻击匈奴的战略，但是，张骞派人作为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相关国家和地区，乌孙也“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3]（P3169）所以张骞对于乌孙的了解由原来的传闻变成了亲自交往，而且还带回了乌孙的使者，加强了汉王朝与中亚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认识。对此，汉武帝拜张骞为“大行，位列九卿”。

张骞死后，汉王朝继续加强与乌孙的交往，由于汉武帝喜欢大宛的宝马，所以汉王朝与乌孙的交往开始由政治层面向以马匹交换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转化，即所谓“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双方的经济交往规模日益扩大，“汉率一岁中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3]（P3170）但由于大宛离汉朝遥远，不肯给汉朝大宛马，武帝闻之，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在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第一次进攻大宛。但首战失利，退守敦煌。武帝盛怒，增加援军，再攻大宛。因长期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故对汉不友好。汉武帝时为夺汗血马围大宛城四十日，被迫与汉结盟。

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李广利再伐大宛，所到之处各国出迎供粮，在杀死不迎的轮台王后，汉军直抵大宛城，围攻四十余天后，大宛贵族临阵杀大宛国王。汉军得到了大宛好马，并扶持亲汉的大宛贵人昧蔡为王，虽然后来昧蔡被杀，但亲附汉朝，遣太子为质、年贡马二匹成为定制。

伐宛大胜之后，汉与西域诸国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统辖关系，“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孔雀河），往往有亭。而轮台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3]（P3179）从此，西域开始纳入汉朝统治，轮台成了经营西域的前哨阵地。西域的大宛、乌孙都把贵族子弟送到长安为质。

四

综上，《史记·大宛列传》是汉民族认识西域、开拓西域、经营西域最早的史料，其学术价值重大。此外还有几点值得强调。

第一，《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人关于古代中亚乃至涉及欧洲古代人文、地理和政治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西北最重要的民族史志。

第二，广义西域自古就是一个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交错分布的区域，但是在《史记·大宛列传》之前，中国的古代文献很少有记载，而《史记·大宛列传》以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展示了广义西域（包括今天中亚、西亚）人种、民族及民族性，例如说“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3]（P3174）其中的“深眼、多须髯”肯定不是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质特征，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这些民族的民族性是善于经商。

第三，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由于匈奴逐月氏西迁和匈奴势力进入西域，以及汉王朝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进入西域，从而使古代希腊、波斯的印欧语系民族和文化退出西域，汉民族、汉文化在公元前 2 世纪大量进入广义的西域，开始对西域进行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从此，汉王朝的疆域向西扩展，同时也扩大了汉王朝在广义西域的影响。

第四，《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广义西域的民族政治格局变化。例如月氏受到匈奴与乌孙

的联合进攻,又被迫离开了伊犁河流域再次西迁,经大宛,进入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进入大夏后,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南逃,大月氏统治者在大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却接受了大夏文化,后来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月氏渐渐融入了当地民族。由此说明了大月氏西迁徙引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变化,使公元前2世纪中亚、西亚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第五,《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几个发现。首先是发现了蜀身毒道的存在,即"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3](P3166)其次是张骞为了寻找南方蜀身毒道,进一步了解到了昆明族的一些情况,认为昆明族是一个大的民族群体,但是却没有大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民族性格喜掠夺,这些发现补充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昆明族的材料,使人们对昆明族有了更多认识;再次是发现了乘象国滇越,即"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3](P3166)说明滇越是蜀身毒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群体,这一记述为我们今天研究百越民族提供了有力而可信的文献记载,不仅如此,还告诉了我们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这对于云南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第六,《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明确记载了从西域引进汉王朝境内没有的物种,其中最特别的是葡萄酒和苜蓿。对于"蒲陶酒",绝大多数西域的民族都喜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人民)俗嗜酒,马嗜苜蓿。"[3](P3173)对此,汉武帝让汉朝的使者带回种子,"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者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3](P3174)因此丰富了汉民族的物质生活。

第七,《史记·大宛列传》还记述了有关黄河源头的问题,即张骞了解到黄河源头的所在地,与前人的记载"河出昆仑"不同,较为真实具体,所以司马迁说 "今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3](P3179)

总之,对于《史记·大宛列传》的价值,本传的"索隐述赞"最为中肯,在此以为之本文的结束 "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窥海上。条枝西入,天马内向。葱岭无尘,盐池息浪。旷哉绝域,往往亭障。"[3](P3180)

[参考文献]

[1] 王文光,仇学琴.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J].思想战线,2008,(2).

[2] 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3] 史记·大宛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

[4] 饮冰室文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5] 汉书·西域传[M].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

Han Dynasty's Management of Northwest Ethnic Peoples and Its attitude toward Central and South Asian Nations in Terms of *Shih Chi – Da Wan Biographies*

WANG Wen – guang[1], YOU Wei – qiong[2]

(1. Yunna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Ethnic Studies of Southwest China's Frontier, Kunming, 650000, Yunnan, China;
2. 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and Huns is the principal national conflict of Han Dynasty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Qin and Han.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Huns, Zhang Qian was on a mission to seek an alliance with Yuezhi which was to the west of China. *Shih Chi – Da Wan Biographies* followed Zhang Qian's visit route and introduce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central Asia and even remoter western area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people broadened their range of ethic studies, from Han Dynasty to today's central Asia or even to the Europe. Thus *Chi – Da Wan Biographies* has the character of World History. Th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region was reinforced by Zhang Qian's diplomatic mission. From then on, Han Dynasty started governing a part of nations in western region, setting up political areas and enrolling them in a unified multi – ethic country. *Chi – DaWan Biographies'* recording of different western minorities is the ethnography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It is also the precious cultural treasure for us.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nati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

〔责任编辑:李 官〕